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历程及其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黄志钢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摘要: 探讨为何要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现代史研究绕不开的议题。尽管众多学者给出了诸多原因,但却总有模糊笼统、不够透彻之感。究其缘由主要在于未能结合“一边倒”政策之时空背景。此外,对于“先重后轻”与“先轻后重”两种战略和重工业发展的民用军用方向的比较研究也略显不足。为此,本文将从“一边倒”历程的阶段性探究出发,来解读该战略的阶段性内涵,并在比较研究中评析相关理由,力图从历史逻辑上展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意义与本质所在,并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值进行分析。

关键词: “一边倒”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156 项工程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2)10-099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2.10.006

一、引言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大的经济战略,围绕此主题诸多学者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如探讨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问题(朱佳木,2004)、中国工业化路径及其“轻、重”之辨(武力,2005、2006)、重工业优先发展与城市化(陈斌开,2010)与工业城市发展(周明长,2004)、与技术进步(林柏,2007)、与农民迁徙权变迁(李厚刚,2015)的关系等;以及对重工业战略内容与抉择展开的解析(叶扬兵,2002;张占斌,2007;刘海飞,2017)及其形成背景与原因的探析等(储成仿,2005),可谓精彩纷呈。然而,不管从何角度探讨,都必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何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此,相关理由可大致归为:一是主观因素:为加快工业化速度、为改变重工业落后面貌、为改变与大国地位不相称状况及加强国防安全等;二是苏联因素:苏联模式示范效应、苏联援助、苏联道路及其意识形态影响等;三是朝鲜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封锁禁运;四是国内因素:保证重工业平衡布局、重点发展、实现生产资料进口替代等;五是重工业诸多裨益驱使:供应工

收稿日期:2022-9-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21JJD710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编号:20ZDA01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志钢(1971-),男,江西景德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史;郭冠清(1967-),男,河北邯郸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资本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西方经济理论。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业原料与设备,促进产业升级、加强国防力量等;六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使然。其他还有轻工业设备利用率低、开工不足,故重工业要优先发展等。

以上虽未囊括所有,却也基本涵盖了最主要因素,多数学者都以其中若干为由。然而,这些原因虽不无道理,但要回答为何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却有不够透彻之感。究其缘由:其一,在于结合“一边倒”之时空背景探究不足,研究视角广度不够,仅将其看成单纯的经济战略;其二,未展现该战略形成之历程,明晰战略构想、落实与实施的三阶段,毕竟任何战略形成都非一蹴而就;其三,正因战略阶段分析不足,大而化之,常使原因、条件与结果三者模糊笼统,易混淆“因缘之别”,甚至“倒果为因”;其四,比较研究不足,即与“先轻后重”战略对比后,再言应“先重后轻”则更具说服力;其五,未区分重工业发展的民用军用两大方向及其为农轻业和为军工业提供设备与装备导致的不同功效。其中,结合“一边倒”政策来探究至为关键:因为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该战略的原因与本质;只有通过解析“一边倒”历程,才能明晰该战略三阶段划分的时间点与意涵;只有从“一边倒”视角,才能明了“先重后轻”为何是必然性安排以及重工业发展方向的抉择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本文将从“一边倒”历程的阶段性探究出发,来解读该战略的三阶段内涵,并通过比较研究评析相关理由,力图历史逻辑地展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意义与本质所在。

二、“一边倒”政策的决定性意义

与重工业研究类似,“一边倒”之文献也是汗牛充栋,观点众多且对立交锋:如“一边倒”成因存在“被动”与“主动”之辨;是“唯一选择”或“一种选择”之论;抉择因素有“国家利益主导”与“意识形态主导”之分;具“正面作用”或“负面作用”以及是否“独立自主”之争等。此则聚焦于“外交含义”与“内政含义”之分歧(胡礼忠,2005),认为将“一边倒”称为外交政策并不全面,无法显现其对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决定性意义。就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发展道路(牛军,1995),实际就是表明要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锁定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上面(孔寒冰,2001)。故“一边倒”作为一个决定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政策,当然绝非仅仅在外交层面;而在一国还未建立之前就率先确立并努力践行的政策,必是立国之策。正如章百家所言,“一边倒”是“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①,而之所以具有总揽全局的决定性意义,从其所占高度、覆盖广度及最终落实的艰辛程度,就可见一斑。为总体把握“一边倒”的逻辑脉络,在此将其历程分为酝酿沟通、会面磋商、缔结同盟与任务落实四个阶段来解析。

(一)酝酿沟通阶段

所谓酝酿沟通阶段,是指1945年至1949年中苏领导互访前的四年时间,包含表态、沟通、明朗化几个过程。酝酿“一边倒”,毛泽东早在1945年甚至更早^②就开始了,其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所需四个条件之一,就“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坦露了亲苏心声;继而在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构造“中间地带”理论,将世界分为美苏与“中间地带”三部分,指出美国“反苏”是“烟幕”,真意在“中间地带”,突出中国价值及其在美苏之间的缓冲作用,强调建立反美国际国内统一战线,亮明亲苏反美立场,“一边倒”倾向显露端倪。接着从1947年夏到1949年初,中苏进入往来函电沟通和试探过程,此间发生两件大事让中共“一边倒”态度明朗化:一是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宣称世界已形成以苏联为首

^① 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3.

^②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沈志华,2009)。尽管未言及中国,毛泽东却在12月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高度评价情报局的成立,主动响应并站队苏联阵营,声明完全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凸显出“一边倒”态势。二是南斯拉夫事件。1948年6月情报局通过谴责南共决议,指责南共变成富农党,背离国际主义,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而在不清楚苏南冲突本质和实际情形下(刘建平,1999),7月10日中共主动发出《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完全同意情报局,批判铁托集团,“一边倒”立场明朗化。不过,尽管中方一再积极主动表明亲苏立场,似都未取得斯大林信任,故毛泽东1947年初就提出访苏,此后又于1948年4月、11月21日、12月14日多次提出^①,均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回绝。直至1949年初,才终于取得斯大林初步信任,委派米高扬访华,结束了酝酿沟通期,“一边倒”进入会面磋商阶段。

(二)会面磋商阶段

所谓会面磋商,是指两党高层互访,当面沟通、试探与摸底,分为米高扬秘访与刘少奇回访两过程。此阶段重大成果是双方口头达成一致意见,为毛泽东赢得了公开声明“一边倒”的机会,也为双方最高领袖直接面谈创造了条件。

1949年1月底,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密往西柏坡,这次为期7天来去匆匆的摸底探访,就如一次神秘面试,化名密访、只听不答,主要在思想立场、发展道路等形而上层面进行沟通,听取中共历史、现状及其政经、军事、外交等的方针和政策。通过会面,中共向米高扬展现了倒向苏联阵营,不走中间道路的坚定立场;痛斥铁托叛徒,绝不与之伍的鲜明态度;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经验,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而在现实层面,中共领导人谈得最多的就是要求莫斯科给予援助。与此同时,在米高扬为数不多的表态中,却主动谈起了应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沈志华,2009),实际给出了苏方接受“一边倒”的具体要求。米高扬这次密访虽匆忙,但在原则性问题上显然双方达成了一致,而一些具体细节,当然绝非声称只“带着耳朵来的”^②,不置可否的米高扬所能解决的。中方回访进一步沟通,探析斯大林真实意图,就势所必然了。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一行人秘达莫斯科,与米高扬行色匆匆相比,这次回访直到8月14日才结束。可见,这不仅要明确原则问题,更要在细节上达成一致。据中央政治局讨论,此行有三个任务^③,除介绍中国革命状况与经验外,则是两个重大问题的明晰化:一是苏援问题;二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实质就是中共领导东亚革命的问题。二者乃中苏各自向对方提出的具体要求。刘少奇此行虽耗时较长,但最重要的问题却在第一周的三个时点就基本完成:一是6月27日晚,刘少奇向斯大林全面汇报中国革命状况、新中国筹建计划及国体、政体等内外大政方针。出人意料的是,仅此首次会谈,斯大林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表示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国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④。二是斯大林的积极回应给了毛泽东一颗定心丸。为彻底亮明倒苏立场,消除斯大林疑虑,趁热打铁,毛泽东1949年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三是7月4日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强调:“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⑤对于报告,“斯大林非常难得,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64.

^② 米高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参见:周恩来传(1898—1976)(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824.

^③ 师哲. 在历史巨人身边[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95.

^④ 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A]. A. M. 列多夫斯基. 斯大林与中国[M]. 陈春华,刘存宽,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⑤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连着批了15个‘对’，并且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世芳、汪文庆，2010）。至此，“一边倒”政策就可谓双方达成口头一致，实际上也成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策。

（三）缔结同盟阶段

米高扬与刘少奇的互访，为双方最高领袖面谈铺平了道路。毛泽东访苏成行，意味着“一边倒”进至缔结同盟阶段。若说1949年7月4日报告后，中苏关系类似订婚阶段；那么缔结同盟就如领结婚证，双方关系在法律层面得以确立。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京，直至次年2月双方签约三天后才回国，最高领袖会面耗时两个多月，足以表明签约过程极不顺利。这通过几个时点双方言行，即可窥其缘由：一是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晚就同斯大林面谈，与刘少奇首次会谈就几乎答应所有要求形成极大反差，斯大林明确否定了重订新约的可能性^①（此前与中华民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是一周后12月24日再次会谈，尽管会前毛泽东请人告之，对签新约最感兴趣，但斯大林只字不提，却大谈越南、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兄弟党之事。而恰在当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发出电报，决定抗法援越^②。显然这是中方积极回应斯大林，迅速行动承担起领导东亚革命的大任。三是尽管中方以实际行动表明诚意，但斯大林此后却未再约见毛泽东，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牢骚：“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吃饭、睡觉、拉屎。”就在毛泽东的不满沸沸扬扬惊动了西方之后^③，又一周后的1950年1月2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征求签约意见。至此，重订条约才提上日程，距毛泽东到苏已过半月。四是1950年1月22日周恩来抵苏后三天，双方展开原则性会谈，才算正式开启了签约谈判。同样也恰在当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14000名朝鲜籍士兵携带武器回国，而此前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战争实现朝鲜统一^④。显然，毛泽东此刻改变心意，与抗法援越一样，都是以实际行动主动响应斯大林，展现诚意以促签约。最后，经过两个月拉锯战，1950年2月14日双方才正式签约。至此，“一边倒”就获得了公开正式的、法律意义上的确认，接续就是双方以实际行动落实同盟的义务与责任。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态度前后差异甚大，但态度是筹码，也是谈判利器。故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外，还附加了三个协定，其中一项就是在斯大林迫使下签订的秘密《补充协定》，内容大致是将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势力范围，虽然毛泽东最初不同意，但在斯大林坚持下只好让步（刘存宽，2000）。

由上，条约未签之时，要求援越助朝；条约签订之际，又附秘密协定，可见签约一事之不易；再加上多年的酝酿沟通与会面磋商，足以明证“一边倒”之艰辛。因为“一边倒”并非中方一厢情愿想“倒”就能“倒”，须得到精打细算又工于心计的斯大林认可与接受，方能确立。是故“一边倒”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政策可相提并论，实是新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模式、发展道路等全方位的“一边倒”。其后在苏援“156项工程”推动下，克隆了斯大林体制，构建了苏联模式的中国，此对古老的传统中国，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巨变，说其为全方位影响深远的立国之策，实不为过。

三、“先重后轻”与“先轻后重”战略之辨析

缔结同盟后，中国就正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走过三个阶段的“一边倒”也进入各自履约的任务落实阶段，即双方落实两大任务：一是中方落实领导东亚革命任务；二是苏方落实援助任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J]. 党史研究资料, 1998(05).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186-187.

③ 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 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1949-1976)[M]. 北京: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④ 沈志华.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 决策过程及其原因[J]. 炎黄春秋, 2015(02). “经聂荣臻请示中央, 1月22日批复同意。这些朝鲜籍战士集结在河南省郑州后便乘火车回国, 并于4月18日到达元山。”参见: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J]. 解放军出版社, 1982: 744.

务。此须一提的是，“一边倒”前三阶段虽跌宕起伏，但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言，却始终处于构想阶段。因为该战略之落实必以苏援为前提条件，这要视双方谈判状况而定。签约之前，自是悬而未决；签约之后，苏方履约施援，才意味着构想阶段的结束和落实阶段的开启。启动标志就是签约后，毛泽东带回的首批50项苏援，轻重之比1:49。虽然重工业战略已启动且“重轻”态势如此明显，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却有“先轻后重”之声不绝于耳，此后又有因朝鲜战争而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之说。然而，苏援和中方领导东亚革命，是双方结盟后各自的既定任务，如此，怎会存在“先轻后重”的选择空间？朝鲜战争一旦爆发，中方必须履约参战，如此，抗美援朝又怎会成为“先后轻重”的原因？

（一）两种经济战略之说

一个战乱连年的国家，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首要必是恢复而非发展，这是常识。三年恢复期后，经济发展方向如何定，工业化道路如何走，就存在选择性。从历史经验看有三种借鉴：率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英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农轻重并行发展的德日模式。在工业革命爆发两百年后，对一个落后、急欲工业化的中国而言，只需引进机器、技术发展重工业，实现用机器生产机器，即可直入工业化，英美模式不是选项。如此，就似有两个选项，但其实不然。因为历经艰辛甚至忍辱负重而终于确立的“一边倒”，早已锁定苏联模式，否则斯大林怎会接受“一边倒”？然而，当时党内却的确存在两种声音，给人感觉似有两种战略选择空间，此由中央高层之言论即可见。

从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观点看：1949年12月周恩来讲到“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①”。1951年3月提出“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②。显然，周恩来观点是以农为基，先农多轻后重。1950年6月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谈到“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专门去搞工业”。提出了工业化瓶颈——资金来源问题，论证了以农为首的必要性。1950年上半年刘少奇就更清晰地描绘了工业化演进轨迹：“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的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上要遵循这样的道路前进。”^③此外，当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也都曾提出过要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的想法（储成仿，2005）。由此，可将此演进轨迹归纳为：经济恢复——发展农业、轻工业——发展重工业——农业、轻工业机械化。

然而，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工业化则完全是另一态度。早在1945年七大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之后……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始终都强调“先重后轻”，并将重工业与国防紧密相联。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国防、军工业，限制私人资本，国家垄断向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资本贸易权，意味着政府是推进工业化的唯一力量，否定德日模式，认为德日模式会走上军事帝国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前途是社会主义。1951年2月开始酝酿“一五”计划，而对计划的核心，毛泽东有个言简意赅的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④可谓一“挤”道破天

① 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77.

② 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55.

③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72-173.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机,不惜代价尽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乃毛泽东心愿。12月又描绘了心中的工业化道路:“从一九五三年起……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①由此,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演进轨迹可归纳为:经济恢复——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农业、轻工业机械化。与上相比,少了一个重工业之前农轻业发展环节,但这个缺失与否,却决定了二者存在根本性冲突,甚至会颠覆“一边倒”。

(二)两种经济战略分歧的实质

表象看,两种战略的分歧是重工业优先与否的次序问题,实质却是现实可行性、经济效益、政治效应乃至发展道路、前途等根本性的差异问题。

首先,从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基础的现实层面看:“先轻后重”战略契合实际。1949年全国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后大工业形成国有经济,当时国营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③,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总值中轻工业仅占工业的7.85%,意味着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了重工业,私有经济集中了占比90%的农轻业。如此,发展农轻业就与彼时所有制结构下的经济基础天然契合,顺理成章;二从经济效应看:发展农轻业必将繁荣市场扩大交易规模,丰富吃穿住行日常用品,可快速改善长年战乱后的民众生活,同时又可积累大量资金,赚取外汇投资于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工业,公私经济相得益彰;三从社会效应看:发展农轻业可扩大就业,推进城市化,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合乎理性且民心所向,“仁心仁政”,执政者可谓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四从技术层面看: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技术封锁大都在军事方面,民用领域不会遭受大限制,这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下资本家逐利本性所决定的,苏联就是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开始的工业化。况且,美国封锁并不意味整个西方国家的封锁,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瑞典、瑞士、芬兰、丹麦、挪威等多国与我国建交,而英国1950年1月6日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17日双方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可见,从现实、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看,“先轻后重”似乎更加现实可行,更加合乎自然。

然而,从政治效应与未来视角看,则呈现另一场景。其一,“先轻后重”势必率先夯实及壮大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由市场下的经济基础,市场越繁荣,人财物就越流向私有经济,资源自由配置规律决定了国有经济比重必然降低,削弱公有制基础,必将阻碍、甚至扭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与架构,弱化党执政基础,将新民主主义推向资本主义轨道;其二,私有制经济基础壮大后,为通畅社会主义道路,政府就须耗费极大气力限制私有强化国有,但私有经济分散决策、充满活力与高效运行的特点,会导致尾大不掉,极大挑战政府行政力,加大治理成本;同时,也必将增强资本家的势力与行动力,推动资产阶级参与实质性执政,工业化道路就可能转向德日模式,由政府与资本家联合推动工业化进程;其三,鉴于社会主义阵营普遍落后的农轻技术,发展农轻业必推动资本家和商团靠拢西方企业与财团,国内私有经济与资产阶级必将获得国际资本势力护持而发展壮大。如是,将对中共执政地位、掌控力、动员全社会资源能力及贯彻党的意志等带来重大挑战与考验。所有这一切,将极可能导致中国出现一个所谓“铁托式胜利”^④,如此,“一边倒”将会因得不到苏联支持

^①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改写和加写的三段文字中第一段的部分内容。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33.

^④ 指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抛弃僵硬的冷战思维,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尺度,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内外事务。

而塌陷,因为斯大林念兹在兹的就是绝对不会允许身边再出现一个“铁托式胜利”^①。

可见,两种战略分歧的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短期与长期的冲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选择“一边倒”,就是选择了当时认为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苏联模式。如此,中国发展就必须符合社会主义规律,服从斯大林意愿,采纳斯大林体制。是故,“先重后轻”作为“一边倒”立国之策下既定的经济战略,作为中苏同盟的共同承诺,实是板上钉钉的不二选择,是中共执政下的必然性要求。如此时空背景,再反观“先轻后重”,就似“水中月,镜中花”。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然性安排

从历程看,确立“一边倒”实属不易,这是双方多年沟通,中方付诸一系列行动并作出种种让步的成果。而寻求苏援发展重工业,又始终是中方谈判的重中之重。在会面磋商阶段,特别是刘少奇访苏期间,中方主要精力都用于与苏联协调国内政策及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经验,并带回一批专家和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模式(牛军,1995)。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调整、制定一系列政策配合苏援下的重工业发展,统购统销、贸易垄断、户籍制、“三大改造”等都是为此,故重工业优先发展是无需商榷的既定安排。既如此,刘少奇为何又要提出与之相左的“先轻后重”?朝鲜战争是中苏签约后,在斯大林支持下由金日成挑起的,中方知晓并被迫出兵^②,如何也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由?

首先,“先重后轻”是党内共识,党内一致支持“一边倒”就意味着完全赞同该战略;却并非党外共识,新民主主义需倾向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人士的支持配合,“先轻后重”也许更符合一些党外人士的心声。《共同纲领》第35条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此虽谈到重工业为重点,但也同时强调轻工业,重轻分量差异不大;况且此重工业是服务于轻工业,以供人民日常消费之需,与“先重后轻”之“重”差异甚大。而刘少奇作为“一边倒”的推手和热衷社会主义改造的旗手^③,当然尽知“先重后轻”的内容与实质;作为德日模式明确的反对者^④,当然尽知“先轻后重”的德日模式趋向,却又大谈“先轻后重”,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对于身为协调民主党派的领导^⑤,这不过是对党外声音的顺应与安抚,是舒缓民主党派情绪的手段与方法。是故,看似相争的两种战略之说,意在产生对冲效应,减缓苏援谈判的阻力,反其道而为之,旨在更顺利地推进“先重后轻”战略落实。

其次,朝鲜战争是条件而非原因。因毛泽东带回首批50项苏援,就已启动了该战略,此时战争还未爆发;若非说战争是理由,基于中方被迫放弃攻台而不得不入朝的事实,与其说是朝鲜战争,不如说解放台湾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尽管如此,朝鲜战争之意义也不可小觑,因为中方出兵朝鲜是斯大林同意大规模苏援的前提,是决定该战略能否全面落实的关键,自然也是其全面落实的先决条件;而一旦参战,朝鲜战争又反之成为中方要求苏援并促其落实的筹码和催化剂。

①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评价斯大林说: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② 金日成在访苏后1950年5月13日至16日到北京进行过秘密访问,通报经斯大林同意要统一朝鲜,14日晚毛泽东得到斯大林电报证实金日成说法。15日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参见:沈志华.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J].炎黄春秋,2015(02).

③ 1949年在2月3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刘少奇强调:“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考虑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2.向我们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派来各种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3.为我们提供资金。”参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J].中共党史研究,2009(04).

④ 1949年6月,刘少奇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39.

⑤ 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刘少奇就专门拍电报汇报了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新约的态度。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40.

事实也的确如此,斯大林爽快慷慨地签订第二批 91 项工程,即是明证。对此,陈云曾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援助是真心实意的。”(薄一波,1997)反之,若中方不入朝,斯大林则拒绝援助,重工业战略虽启动但终究无法全面落实,就是可想而知的后果。是故,抗美援朝与大规模苏援是双方的责任,具促进剂与催化剂功效,都是该战略全面落实的前提条件而非原因,并且前者还是后者的条件。条件不是原因,原因是出发点,条件是落实与实施的保障,以其为因,混淆了“因缘之别”。

此外,朝鲜战争另一重大意义就是不仅成为此前言谈“先轻后重”领导人转调的契机,更成为极好的向社会各阶层宣扬“先重后轻”,并着力渲染国防工业紧迫性的良机。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宣称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①与5个月前说辞相比,可谓180度急转弯。显然,借助朝鲜战争,既可宣扬重工业战略的重要性,更可强调军工业的迫切性。如此,将重工业优先发展锁定于军工与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作为“一边倒”国策下的经济战略,依靠苏援实施“先重后轻”从来就是确定项,一直都是必然性安排;“先轻后重”则像一个烟雾弹、稳定器,旨在消除战略推进的障碍,时机一旦成熟,“先轻后重”之声必戛然而止。1951年7月5日,刘少奇慷慨激昂的《春藕斋讲话》就可谓截止点,此后类似言论就未再现(朱佳木,2004)。肇因1951年7月1日,朝鲜交战双方口头同意停战谈判,7月10日谈判正式开始。战争形势的缓和使中方因参战而有底气与把握获得大规模苏援,也意味着重工业战略即将全面落实。是故,众口一词重工业优先正当其时,紧锣密鼓大规模行动适逢其候。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基础工业,并建立国防工业领导机构(吴明曦,1999)。1952年初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等6位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编制“一五”计划,并决定编好后征求苏联意见。1952年8月周恩来率团访苏,征询对计划的意见及商谈苏援具体方案,斯大林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必须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帮助建设。至此,抗美援朝的意义与功效显露无疑。

可见,无论抛出“先轻后重”之说,还是被迫抗美援朝之举,都旨在顺利落实既定的重工业战略,斯大林慷慨答应91项苏援,即是战略全面落实的时间点,“一五”计划就是战略实施计划。至此,将重工业战略构想、落实与实施三阶段与“一边倒”四阶段相比,有如下特点:第一,重工业战略构想从“一边倒”酝酿期就开始了,直至中苏签约,横跨前三阶段,难度大;第二,作为“一边倒”既定内容之一,落实重工业战略也是落实“一边倒”的任务,两个落实阶段基本重叠。从首批50项苏援始,至斯大林慷慨允诺91项,期间中方抗美援朝至为关键,代价大;第三,重工业战略实施之时就是“一五”计划全面铺开之际,此时“一边倒”已完全确立。此强调战略三阶段之划分,意在表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真正原因在构想阶段,将后两阶段发生之事以为其由,要么混淆“因缘之别”,要么似嫌“倒果为因”。

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方向与效应

一个基本事实:若无重工业支撑,轻工业无论如何发展,根本上都无法摆脱农业依附。劳动资料仍是手工工具和畜力,劳动对象扩大取决于农业剩余,故轻工业化无法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跨越。但发展重工业能提供工业原料,推进农轻业机器化,促其优化升级,因此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发展重工业,工业化道路就是由重工业推动前行的道路。既然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工业化的一

^① 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116.

个重大利好抉择,《共同纲领》也提到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为何还会有反对之声的顾虑呢?这就须从战略实施阶段入手,探讨重工业发展方向及“先重后轻”之“重”的本质所在。

(一)重工业发展的方向

从重、轻工业角度分类看:重工业主要生产生产资料,分三类:(1)制造业,如制造农机、化肥和工业设备等工业;(2)原料工业,提供制造业所需原材料,如金属冶炼、化工原料、钢材等,及提供动力燃料,如电力、石油等;(3)采掘工业,开采金属、非金属矿及采伐木材等。轻工业则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造手工工具,分两类:一是,以农产品为原料,如食品、纺织等工业;二是,以工业品为原料,如文教体育、日用金属、手工工具等(杨宏义、金玉贵,1986)。显然,重工业生产原料、矿产和生产资料,处于社会化生产上游,服务于联系消费环节的消费资料生产,为其提供机器与原料,涵盖基础工业与制造业两大类。其中,后者是关键性枢纽,决定了前者的原料矿产用来制造何种机器;而此机器是服务于农轻业或军工业,又决定了重工业发展的民用与军用两大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极端落后,之所以能快速构建工业体系,乃“156项工程”所致,前文毛泽东一“挤”,实已道破重工业军用方向发展的天机,这由“156项工程”的内容、布局及制造业构成,即可明证。

(二)“156项工程”构建的工业体系

要快速简明了解“156项工程”,可从若干关键数入手。首先分三批引进,分别是1950年50项、1953年91项和1954年15项,俗称“156项工程”;其次,实际商谈五次共引进174项,最后确定154项,因公布156项在先,故仍称“156项工程”,最终实施150项。其三,首批50项,除了1项轻工业,都是重工业;第二批91项,除两项医药业外,均为重工业,而军工超三分之一。第三批15项是1954年与赫鲁晓夫商定的,为了完成而补充之前的“141项”协议和海军“六·四协定”的援助项目(张翼鹏,2021)。此均为商谈数据,实施时则有差异,见表1:

表1 实际施工150项工程分批建设情况^①

类别	项目	总数	第一批	第二批	后三批	备注:
基础工业(79)	能源工业(52)	煤矿(25)	5	9	11	1. 称后三批是因第二批后商定三次:1954年15项、1955年16项与后来口头商定2项。174项中有取消、合并、拆分多种情况,此表根据协议生效与开工年份综合所得。 2. 第三批抚顺第二制油厂、鞍钢第三炼钢厂归前期。第三批军工项目哈尔滨蒸汽透平厂、哈尔滨锅炉制造厂、船用电机制造车间归前期。 3. 佳木斯造纸厂生产水泥纸袋。
		电力(25)	8	9	8	
		石油(2)			2	
	冶金工业(20)	钢铁(7)	4	3		
		有色金属(13)	3	7	3	
制造业(68)	化学工业(7)	化工(7)	2	3	2	
	机械加工(24)	机械(24)	6	16	2	
	军工业(44)	军工(44)	7	33	4	
其他(3)	轻工(1)	造纸(1)	1			
	医药(2)	医药(2)		2		
共计(150)			36	84	30	
各批占比			24%	56%	20%	

由表1,首批项目具体实施时变动较大,最后只执行36项,第二批少7项,后三批33项实施了30项。其中1954年签订的第三批旨在补充完善,部分项目归于第二批。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不同,以上数量与实际有出入实属正常,如有学者指出煤炭25项实际只执行17项(蒋洪巽、周国华,1995)。但无论如何,“156项工程”之核心在第二批是确凿的,故说其项目签订之时,就是重工业战略全面落实之际;而第二批军工业的独树一帜,无疑凸显了重工业的军用方向。

从实际施工150项占比看,基础工业占52.6%,制造业占45.4%,都是重工业,唯一轻工业还是生产水泥纸袋,辅助工程建设,就可见“156项工程”之“重”了。超半数基础工业建设的确为构建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但工业体系性质是重工业方向决定的,这取决于制造业。由制造业构成看,

^① 此表依据董志凯等与张久春研究综合而成。参见:董志凯,吴江. 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参见:张久春. 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9(03).

军工项目占 65%，并且 24 项机械工业也多为军工生产而配套建设(申晓勇、武力,2016)，更显示了重工业的军用方向。

对于新建工业，薄一波曾回忆：“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就资源……机械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2)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3)军事上的需要。”因新建民用重工业比重极低，故机械加工只能服务于军工；基础工业又远离民用重工业集中的沿海，也主要服务于就近建设的军企。如化工业生产航空油漆、塑料抗菌素、飞机轮胎等；黑色冶金部要预先考虑在冶金厂生产 T-54 坦克装甲板的能力，建设部、化工部、电站部必须如期完成造船厂和鱼雷生产厂的建筑、卫生设施、交通和电力部分的设计任务等，均服务于军工(张久春,2009)。两家医药企业，华北制药主要生产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太原制药生产的磺胺是二战中广泛使用非常有效的抗感染药，是部队军用药品中重要一员，足可见军需才是新建工业考虑的重中之重。正如陈云所言：“按照五年计划，国防工业是很突出的。为了实现发展国防工业计划，很多民用工业就必须跟上，而且跟的很吃力。有些民用工业，实际上也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建立，比如有些特殊钢厂、化工厂等。”^①

表 2 实际施工 150 工程地区布局情况

序号	省份	项目	非军	军用	备注：
1	东北三省 56 项	辽宁	24	20	1. 军工 44 项：兵器 16、航空 12、电子 10、船舶 4、航天 2。其中直接隶属海空军的有 18 项，电子工业主要服务海空军。兵器工业 16 项中有诸多是弹药、鱼雷等，也主要服务于海空军。如山西军工 8 项中 6 项属于兵器工业，主要是鱼雷制造，产品包括鱼雷、采油机、舰艇配件和弹药、推进剂和发射药等。故发展军工意在优先发展海空军是显然的。 2. 除加强自身的军工建设外，在 1953 年 5 月 15 日第二批苏援签订后，6 月 4 日又签订海军“六四协定” ^② ，购买成品与半成品舰 81 艘，飞机 148 架、火炮 155 门、鱼雷 542 条、水雷 1576 个、浮水炸弹 600 枚及炮弹、通信、雷达等设备，就足见海空军优先发展的本质所在了。
2		黑龙江	22	20	
3		吉林	10	10	
4	陕西	24	7	17	
5	山西	15	7	8	
6	河南	10	9	1	
7	甘肃	8	7	1	
8	四川	6	2	4	
9	河北	5	5	0	
10	内蒙古	5	3	2	
11	北京	4	1	3	
12	云南	4	4	0	
13	湖南	4	3	1	
14	江西	4	3	1	
15	湖北	3	3	0	
16	安徽	1	1	0	
17	新疆	1	1	0	
合计		150	106	44	

由表 2 看，150 项主要布局于中西部 17 个省，但 70% 分布在东北三省及陕西、山西、河南六省，其中东北三省占 38%。东北本是重工基地，此时又吸纳重工业最多，乃“重上加重”，所谓工业平衡布局与此并不成立。而之所以有平衡布局之说，在于打造了中西部重工基地。

除去东北后剩下的 94 项中，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占 49 项；最重要的是，除去东北剩下的 38 个军工项目中，陕西、山西两省就占 25 项，表明所谓平衡布局乃因在中西部新建了军工基地，这与沿海重工业民用方向大相径庭。可见，除强化东北重工基地外，“156 项工程”重头戏是构建内地军工重地。如此布局，显然是考虑军需而非民用，更非考量沿海与内地之平衡。民用军用两种不同性质的重工业布局，其实谈不上平衡而是补充。退一步讲，即便引入民用重工业，理性选择也只能是强化沿海而非平衡内地，如 20 世纪 70 年代旨在改善民生的“四三方案”，引进原则之一就是进口

① 陈云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240.

② 协定内容如下：在 1953—1955 年三年内，苏联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成品舰 32 艘，包括驱逐舰 4 艘、中型潜艇 2 艘、小型潜艇 4 艘、鱼雷快艇 22 艘；半成品舰 49 艘、包括护卫舰 4 艘、中型潜艇 3 艘、大型潜艇 4 艘、基地扫雷舰 4 艘、江河扫雷艇 10 艘、大型鱼雷快艇 24 艘、合计 81 艘，27234 吨；此外有飞机 148 架、火炮 155 门、鱼雷 542 条、水雷 1576 个、浮水炸弹 600 枚及炮弹、通信、雷达等设备。参见：王亚志，沈志华，李丹慧。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61.

设备大部放在沿海沿江,小部放在内地。是故,把由于新建军工基地,内地重工业必然增加的客观结果,解读成旨在平衡内地重工业不足,而列为优先发展之因,似嫌“倒果为因”。又如轻工业开工不足,与人财物大量流入重工业及农轻产品出口抵债密切相关,却被解读成轻工业过剩;至于西方封锁禁运,实是抗美援朝的必然结果,也列为原因之一,都是异曲同工。

此外,从相关政策出台、机构建立与领导谈话中,也可确证“156项工程”旨在构建国防工业体系。首先,“一五”计划首要任务是以“156项工程”为中心进行工业建设,而中心之内核就是国防建设计划。因为就在周恩来访苏前一月,1952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报送的国防建设五年计划(1953—1957年),要求五年内初步建设国防工业(姬文波,2019);8月又成立国防工业部,对外称第二机械工业部(于保中、胡吉勇,1995)。可见,8月周恩来访苏携带的五年计划之核心就是国防建设计划。其次,“一五”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以苏联帮助的156项为中心进行建设,国防工业“一五”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在苏联援助下完成国防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任务,鉴于制造业几乎都是军工及其关联项目,二者核心内容的高度一致性是无疑的。实际上1951年10月,当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基础工业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已挑明:“巩固国防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在工业建设方面,首先必须加强与国防密切关联的重工业。”^①此外,对“156项工程”,薄一波曾言:“在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什么型号飞机可以攻击到它。”^②鲜明体现了军工建设的要求与特点;1953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时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建设与军工生产”(姬文波,2019),更展现了强化军工的意志和决心。所谓重工业优先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防工业和与之相配套基础工业的优先发展(申晓勇,2012),此言不虚。是故,“156项工程”实质就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国防军工体系,而发展海空军装备则是重中之重。

(三)军工业优先发展的功效

军工是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物品的工业,包括兵器、航空航天、舰船、电子、核工业等,产品有枪炮、弹药、坦克、火箭、导弹、军用车辆、飞机、电子装备、被服装具及核武器等^③,无疑隶属于重工业。众所周知,重工业具有资本密度大、生产要素投入多、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短期无效益等特点,而军工业则更甚。由此,在历经浩劫、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发展的军用、民用方向之不同,必会对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政府行为及社会发展轨迹带来迥异的功效。

首先,军工业从始至终都是重工业。军事武器装备与一般机械设备虽都是重工业品,但军品是消费资料,机械设备却是生产资料。军品的重工业品与最终消费品的双重特征,使得军品生产具有链条短、环节少、单向性特点;而一般机械设备则具有供需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生产资料成为消费资料生产的供给方,与下游消费品生产构成重轻工业部门间供需循环;另一方面作为需求方,又与上游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构成重工业内部供需循环,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再循环。不仅如此,军品是纯消费品也是特殊消费品,仅服务于军警、部队等特定消费者,主要为战争提供物质创造条件,启动消费便是破坏与毁灭;而作为民品则旨在改善生活,促进再生产、发展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社会化再生产创造条件。是故,军品生产会对社会化大生产再循环带来阻滞效应,民品生产则反之。

其二,军工大都是资金和技术密集性重工业,使得军品具成本高、价格高、科技含量高的特征,需资本、土地和科技人才的巨大投入,故对生产要素具高聚集效应。又因军队是军品主要订货者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M]. 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18—19.

^②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99.

^③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和消费者,政府与军企关系密切,社会主义国家军企都是国企,使得军品在人财物上对民品都产生极大挤出效应,即政府投入与支出将挤占私人投资和支出;再加上军工产业关联度极大,必促使诸多原料矿产等基础工业服务于军工,更对挤出效应推波助澜。

其三,军品需求结构单一,主要服务于军队等武装力量,决定了军品生产计划通常由政府统一安排部署,也决定了其运行机制必以计划体制为基础:国防工业比重越大,经济运行就越依赖计划体制;民品需求结构则多样化,决定了民品生产需以市场体制为基础。当重工业服务于农轻业时,通过激发民品需求的多样化,又反过来促进生产资料多样化需求,为上游民用重工业扩张带来动力,加速重工业内部循环。反之,军品需求是特定人群、特定用途,且从原料供应、军品生产到需求都来自政府计划安排,加上军品生产链短、单向性特点,不仅无法激发重工业内部循环,并且投入多、周期长、军企规模大,“船大难掉头”,对经济资源产生极大沉淀效应。

鉴于重工业发展的军用民用方向,有诸多差异和迥异功效,在探讨 20 世纪 50 年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不应模糊二者。事实上,正由于军品、军企、军需诸多的特殊效应,在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若优先发展军工业就必然建立高度集中管理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实施票据制、户籍制及低工资、低价格、剪刀差、低汇率、低利率等诸多特殊政策。就如朱佳木(2002)所言:根本上促使中国共产党作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决定,是因为要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其实“一五”计划本就两大任务——“一化三改”,通过“三大改造”动员全社会资源,集中人财物完成“156 项工程”,即是“一五”计划的真意所在。

(四) 结论与小结

“一边倒”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存在隶属关系,选择了前者,就确定了后者;探讨后者,需先明了前者。要认清其真正原因,只能从“一边倒”确立前的战略构想阶段去寻。因为“一边倒”确立后,即中苏签约之后,就进入任务落实阶段,意味着该战略已正式开启,此后种种事件当然不是原因,而是落实条件乃至实施后果。以此为因,要么混淆“因缘之别”,要么似嫌“倒果为因”。至于重工业诸多裨益驱使之由,除加强国防外,多是将重工业民用方向的“利益之冠”戴在了军用头上;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使然^①则子虚乌有,因为按此规律最快增长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但苏援大都引进成套设备,增长最快的是制造原材料、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的消费资料主要是兼具重工业品与消费品特性的军品;况且规律都依自然过程可言,苏援引进是有计划的人为操作,非规律使然。如此,真正原因就在主观因素与苏联因素中,但前者大都太过宽泛;后者的苏援是条件而非原因,至于苏联模式、意识形态等是形而上之外因,二者均未切中要点、展现具体内核,真正的根本原因都是具体内在的,而非泛泛表外的。

具体内因为何?大道至简。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最现实最具体的内因莫过于夺取政权。“一边倒”正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与保障,此时还谈不上重工业建设,只希望获取现成装备赢得战争;随着内战胜利形势明朗化,建政目标无虞后,另一具体内因——台湾问题悄然而至。肇因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之际,从 1948 年底就相继安排各项入台事宜,至 1949 年 5 月基本完成所有部署,在台湾立稳脚跟。这对缺少海空军的解放军攻台造成极大困扰,尤其 10 月金门战役失利后,解放台湾就成为十分棘手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正是这个明确而艰巨的重任,成为借助苏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根本内因,也决定了其本质必是军工业优先发展;又鉴于解放台湾首要就是建设海空军^②,决定了更本质内核是海空军装备优先发展。解放台湾——重工业优先发展——

^① 具体讲,即是社会扩大再生产必使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其中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其次,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最慢。

^② 牛军. 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05). “解放台湾包括三个内容: 其一是建立现代化海军和空军……;其二……建立攻占台湾的军事基地;其三是在 1950—1951 年发动跨海峡作战, 完成国家统一。”

军工业优先发展——海空军装备优先发展,即是 20 世纪 50 年代重工业战略的本质逻辑。

然而,台湾岛仅占 63000 平方公里,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此问题极为重大,对此深入探讨非本文所能,但一言以蔽之的结论可谓:台湾岛不仅是各方博弈的重大政治筹码,也是全球政治与军事的极度敏感点;尤其对中方而言,更是涉及至为关键的历史定位、历史继承性、合法性、国家道统法统及统一大业等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对此,美苏既要打台湾牌,又会极其谨慎,不会轻易越雷池一步,这其实意味着解放台湾只能靠自己,此由当时各方言行即可明证。首先,当毛泽东访苏遇挫之时,美国就开始对台湾采取“撒手政策”(隋淑英,2004),拉拢中共离间中苏;在签约提上日程后三天的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则抛出无意在台湾取得特权、建立军事基地、武力干预及提供军援等言论,诱导中共;12 日艾奇逊更进一步阐明台湾在美远东防御圈之外,有意让中共占领台湾,换取中国对苏联采取疏远政策^①。其次,正是美国的台湾牌使斯大林态度发生翻转,以至于迫不及待表现友好姿态,采取一系列对策赢得毛泽东好感。此外,就在中方对是否入朝参战产生分歧时,斯大林同样也打台湾牌,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暗示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牛军,1995)。其三,至于毛泽东,自国民党立稳台湾后,心心念念就是解放台湾。刘少奇访苏时的 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就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预计 1950 年下半年开始攻台,此前必须建立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还试探性提出请苏联海空军专家及飞行员参加攻台军事行动,希望苏联给予直接军援解放台湾;亲自访苏时,又明确提出要苏联派志愿空军或秘密部队帮助攻台。在斯大林拒绝海空军直接参战,但同意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后,就开始大量定货海空军装备:1950 年共 8800 万美元,1951 年 4500 万美元,加上新增货单约为 1 亿美元。然而,无论顾问或定货均迟迟不到,等到的却是金日成到北京声称斯大林同意他解放朝鲜南方的军事计划。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舰进入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只能暂时作罢。

酝酿朝鲜战争,推动中方抗美援朝,可谓斯大林之良苦用心,既稳固了中方“一边倒”,又摆脱了在攻台问题上同盟协议责任的绑定。虽然斯大林声称同美海空军发生冲突会爆发新世界大战,但双方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却是不争的事实(沈志华,2008)。是故,美苏直接冲突不是问题,关键是在哪里产生冲突。可以说,台湾虽小,却牵动着世界大局,谁掌控了台海局势,谁就掌握了世界大局的主动权;对中国而言,只有解决了台湾问题,才会真正开启历史新进程,翻开历史新篇章。

最后,综合全文可历史逻辑地展现如下认识:第一,“一边倒”的内因经历了从夺权建政到解放台湾的转变,后者也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具体内因;第二,借助苏援发展军工,重点建设海空军,解放台湾是中方最迫切的重任,根本不存在“先轻后重”的可能,“先重后轻”从来就是确定项;第三,“一边倒”能否实现的决定权在斯大林,意味着依赖苏援的重工业战略的启动、落实时间点都取决于斯大林。是故,中方必然参与其推动下的朝鲜战争,这是中方领导东亚革命的责任,否则“一边倒”无法确立,重工业战略即便启动也无法全面落实;第四,正因抗美援朝,斯大林才会慷慨大方签署 91 项工程,全面落实中方的重工业战略;正因朝鲜战争,中方才被迫停止攻台计划,所谓斯大林发动了此战,回避了彼战。朝鲜战争后斯大林之爽快,也可谓攻台计划搁置后对中方的一种补偿。又鉴于美苏不会在台海直接冲突,自主解放台湾就成为中方最现实和最重大的政治任务,至今都是如此;第五,重工业的军用方向表明了军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实质。鉴于军工业诸多特殊效应,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一化”就必然“三改”,二者乃“一体两翼”。由此,通过行政力推动“三改”,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②,就似顺理成章了;而

^① 沈志华. 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J]. 党的文献,2008(04). 以下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此文。

^② 此 1952 年底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504.

大批军企建成投产后,为让军工体系实现产能最大化,“大炼钢铁”也即顺势而为了。

总之,“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的立国之策,重工业优先发展则是其下既定的经济战略,是推进社会全面深刻变革的动力源,撬动传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是故,从“一边倒”出发审视重工业优先发展,就易理解其原因、意义与本质所在,以及当时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与引发的社会变革,有利于准确认知现代史的发端。

五、重工业优先战略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历程的经验总结,对于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启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选择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发展路径

每个不同历史阶段,都面临着不同历史环境,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以所处的生产力状况为先决条件,选择促进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才能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生产力非常落后,又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之中,选择“一边倒”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符合唯物史观原理的,尽管本文没有对此做更多论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构建起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样,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重工业基础,我国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一方面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已很高,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另一方面,我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和经济逆全球化的双重冲击,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关口,需要汲取重工业发展战略确立中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的战略调整,选择适合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路径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立过程可以看出,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一心一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永恒的旋律,闭关锁国从来就不是我国的主导思想,不利用国内的资源优势也很难长期发展。很难想象,没有苏联的项目和资金支持,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没有“一边倒”的战略安排,我国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构建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工业体系。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我国生产力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需要按照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为基础,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附加值,这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中。

(三)坚持独立自主思想,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众所周知,独立自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指导我国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的法宝,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我国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思想。相反,在与苏联交恶之前的 1958 年 6 月,毛泽东就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国策,也正因为如此,在“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之前还有“独立的”定语。

^① 详细可参考: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J].当代经济研究,2020(03):5-13.

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面对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后期一样的技术封锁,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思想,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自主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突破“卡脖子”瓶颈,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参考文献:

1. 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116+239-240.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40.
3.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39+172-173+186-187.
4.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J].党史研究资料,1998(05).
5.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6.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504.
7. 周恩来传(1898-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824.
8. 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77.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99.
10. 陈斌开,林毅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J].南开经济研究,2010(01):3-18.
11. 储成仿.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形成背景、主要经验及其现实意义[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5(05):21-26.
12. 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13. 郭冠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历史和实践[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5(01):28-40.
14. 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J].当代经济研究,2020(03):5-13+113+2.
15. 胡礼忠.中国学术界关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研究述评[J].历史教学问题,2005(06):77-85.
16. 姬文波.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国防工业体系的历史回顾[J].国防科技工业,2019(07):16-17.
17. 蒋洪巽,周国华.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煤炭工业建设项目的由来和变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04):13-21.
18. 金冲及.周恩来传: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55.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0. 孔寒冰.“一边倒”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J].国际政治研究,2001(03):44-51.
21. 李厚刚.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农民迁徙权的变迁[J].江西社会科学,2015,35(08):114-120.
22. 林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国的技术进步:1949-1978[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26-29.
23. 刘存宽.并非完全平等的结盟——试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A].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77-689.
24. 刘海飞.“先轻后重”抑或“先重后轻”?——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抉择[J].北京党史,2017(05):34-39.
25. 刘建平.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1999(05):155-171+208.
26.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744.
27. 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05):37-50+205.
28.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J].历史研究,1999(05):23-42.
29. 申晓勇,武力.中国国防工业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1949-2015)[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05):93-101.
30. 申晓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防工业优先发展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19(04):40-47+125.
31. 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的史料价值拾粹[J].党的文献,2008(04):59-68.
32. 沈志华.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J].炎黄春秋,2015(02).
33. 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J].中共党史研究,2009(04):14-33.
34.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95.
35. 隋淑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J].齐鲁学刊,2004(06):48-54.
36. 王亚志,沈志华,李丹慧.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J].书城,2009(09):114.

37. 文世芳,汪文庆,刘少奇的学习观——访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上将[J]. 百年潮,2010(07):20—25.
38. 吴明曦. 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的光辉篇章——国防科技事业5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J]. 国防,1999(08):39—41.
39. 武力,温锐. 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J]. 经济研究,2006(09):39—49.
40. 武力. 中国工业化路径转换的历史分析[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04):49—58.
41. 杨宏义,金玉贵. 统计工作手册[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42. 叶扬兵. 论“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J]. 社会科学研究,2002(05):119—124.
43. 于保中,胡吉勇. 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简述[J]. 军事历史,1995(06):24—25.
44. 张久春. 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9,1(03):213—222.
45. 张翼鹏. 1954年苏联对华援助15项工业企业项目之缘起问题的再探讨[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06):17—24.
46. 张占斌. 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J]. 中共党史研究,2007(04):13—24.
47. 章百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A]. 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3.
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3.
49. 姚有志.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军事哲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 and 建筑业卷[M]. 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18—19.
51. 周明长. “一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城市的发展[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S1):123—126.
52. 朱佳木.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05):13—24+125.
53. 朱佳木. 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06):30—45+126.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eavy Indust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UANG Zhi-gang GUO Guan-q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836)

Abstract :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to discuss why heavy industry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o development strategy. Although many scholars have given many reasons, they always feel vague. The reason lies in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background of the “one-sided” policy. In additi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strategies of “heavy first and then light” and “light first and then heavy” as well as the civil and military directions of heavy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also slightly insufficient.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exploring stage of “one-sided” process to interpret the phases of the strategic connotation, and to analyze relevant reason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The study tries to logically reveal the reasons, history meanings and essences of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eavy industry and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the strateg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Keywords : “One-sided”; Heavy Industry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156 Projects; New Development Dynamic